

博物视界

中国新疆塔克拉玛干黄沙掩埋的丝路古道下，封存着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1995年，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的千年古墓，一方汉代织锦破土而出。历经近2000年风沙侵蚀，织锦依旧纹理清晰、文字赫然，这就是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最伟大发现之一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以下简称“五星”锦护臂）。它色彩绚烂，织造工艺精湛，是汉代中原与西域互通往来、相融共生的鲜活实证，更是古代丝绸之路文明互通、文化交融的珍贵缩影。

五星出东方：织纹里的天文礼制与家国祈愿

1995年，“五星”锦护臂在尼雅遗址出土。根据同墓出土的弓、箭、箭箠（古时用以盛放弓箭之具）等物品推测，它是古人射箭时所用的护臂用具，织造时代为东汉。经鉴定，“五星”锦护臂采用五重平纹经锦，符合汉代典型织锦经向显花的特征。织锦经密220根/厘米，纬密48根/厘米，织造非常厚实，经线密度更大。

“五星”锦护臂呈圆角长方形，长18.5厘米、宽12.5厘米，四沿用白绢镶边，两个长边各缝缀3条长约21厘米、宽1.5厘米的白色绢带（其中3条残断）。织锦以宝蓝、绛红、草绿、明黄和白色五色经织出星纹、云纹、凤凰、鸾鸟、麒麟、白虎等祥瑞纹样，花纹间织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小篆文字。更精妙的是，织锦的文字和鸟兽、云纹等图案并非刺绣或彩绘，而是同为丝线织就，体现出汉代织锦设计制作的匠心独运、工艺精湛。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典型小篆。“五星”指今天所称的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东方”是我国古代占星术中特定的天穹位置，“中国”当时指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这句话是我国古代占星用辞中的吉祥词，意为当出现五星共现东方之天象，于军国大事有利。由于五大行星围绕太阳公转周期不同，在地球上观察到它们集聚天象的概率极小，因而它们在天空中的位置被赋予了特殊的占星学意义。

“五星”锦护臂纹样瑰丽、文字激扬，它的设计织造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文化内涵。当时的人们将五星视为五行之精，有着明确的现实关怀：战争胜负、王位安危、年成丰歉、水旱灾害等政治、军机和社会大事。《史记·

方寸织锦绣

千年互鉴史

巴音其格



旅人心语

“1749年8月28日正午，时钟刚打十二下，我在美国河畔法兰克福诞生。”这是《歌德自传——诗与真》的开篇，将读者带到文学巨匠辽阔深邃的精神原乡。

因此，来德国法兰克福，歌德故居不可不访。老城区大希尔施格拉本大街上，米黄色小楼沉静如昔，歌德出生在这里，并于此度过童年和大部分青年时光。二战期间，原建筑毁于空袭，战后经精细修缮，故居连同隔壁的歌德博物馆重新向公众开放。

步入故居，仅仅2小时参观便给我留下长久回忆。踩着嘎吱作响的木台阶，我来到二楼会客厅“红厅”（又称“北京厅”）。歌德的父亲热衷于18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中国风”：淡雅的中式花鸟壁纸上，牡丹、莲荷、仙鹤与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红色丝质窗帘垂落四周，华贵大方。厅中陈设着描金红漆家具，摆放有青花瓷等中国瓷器，墙上挂着印有中国传统纹饰的蜡染壁挂。

一位作家的精神底色，往往先经家庭塑形，再由城市涵养。故居博物馆中陈列的木偶戏台是歌德祖母的礼物，它点燃了童年歌德对戏剧的向往，以及无法与现实和解的痛苦，深深打动了无数年轻读者。“维特热”很快蔓延至整个欧洲，人们竞相模仿维特的蓝色燕尾服和黄色长裤，手捧小说传诵其中的句子。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部作品又被陆续译介至东亚，维特的执着追寻与近代东方知识分子重新思考传统、探寻精神世界的心路历程不谋而合，令这部作品跨越文化与时代，在不同国家读者的心中不断激起新的回响。

从书房窗口望出去，庭院里一棵枝叶葱郁的橡树摇曳着未尽的绿意，浓荫一直漫到窗下。春夏时分，水声潺潺，游人笑语盈庭。一椅暖阳，一阵风起，几片树叶伴着满庭花香飞舞。眼前的一切不禁令我想起埃米尔·路德维希在《歌德传》中的记述：“歌德喜欢坐在窗前，看人们在花园里走来走去，孩子们做各种游戏，一边看，一边想象各种故事。”或许是故乡的营养，作家把情感变为创作的灵感源泉，为日后那些不朽作品奠定基础，将德语文学推向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1775年的又一个秋日，26岁的歌德踩着庭院中的萧萧落叶，从法兰克福的家中起程，奔赴魏玛，开始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魏玛生活。前路尚有漫长求索与无尽创作，故居孕育的少年心气与思想火焰始终伴随着他。

图为歌德故居庭院一隅。

刘赫摄

图案符号，被应用于“五星”锦护臂的纹样设计，正是“瑞应德化”和“有道”思想观念的艺术化与形象化表达，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礼制规约，展现了古代中国对和谐统一的追求，承载着中国古人对美好生活的祈愿。

丝路连万里：“精绝”见证开放包容与文明互鉴

“五星”锦护臂是迄今为止在新疆发现年代最早的带有“中国”字样的文物。它不仅揭示了汉朝治理西域的辉煌历史内涵，更凝结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新疆地区曾经出土诸多吉祥语文字锦。在汉代，文字织锦成本高昂，用语亦极为考究，带有吉祥语的织锦多为朝廷命令或封赏赐赠。当时占星和天文历法由皇家史官专门掌管，能将占星用辞作为织锦吉祥语的，只有汉朝负责皇家织造的机构。因此，有专家认为，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锦护臂，或许就来自中原王朝的馈赠。



尼雅遗址位于民丰县北100余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是那里现存遗迹数量最多、遗址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城郭遗址，出土了大量艺术品、纺织品、铜钱、漆器、玻璃器、各种饰物、木简等珍贵文物。

作为汉晋时期“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精绝”所在地，尼雅遗址是往返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西汉时期，张骞两次往来西域，开启了中原王朝和西域地区的密切联系。西汉中央政府设立西域都护府对西域地区进行管辖，其中也包括“精绝”。



由的向往，以及无法与现实和解的痛苦，深深打动了无数年轻读者。“维特热”很快蔓延至整个欧洲，人们竞相模仿维特的蓝色燕尾服和黄色长裤，手捧小说传诵其中的句子。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部作品又被陆续译介至东亚，维特的执着追寻与近代东方知识分子重新思考传统、探寻精神世界的

瓷韵文脉越沧海

陈康令



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六十一项世界遗产。北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因瓷闻名的浮梁县昌南镇改称“景德镇”。自此，以景德镇为枢纽的瓷器产业链和贸易网络通达海，千余年来，持续绘就“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繁盛图景。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一件件中国瓷器循着商路与航道远播四海，成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公元9世纪上半叶，一艘阿拉伯商船不幸沉没，这艘在今天被称为“黑石号”的船上载有各类中国陶瓷制品6.7万余件，一些长沙窑瓷器写有“孤雁南天远，寒风切切惊”等诗句，记录下唐诗汉韵流行海外的生动场景。举世闻名的青花瓷尤兴盛于元明之际，中华经典纹样、波斯苏麻离青与伊斯兰艺术风格融汇一体。青花瓷不仅在明代成为宫廷御用瓷器，还是郑和七下西洋馈赠各国君主贵族的珍贵礼物，从东南亚到非洲东海岸，后世考古皆发现彼时遗留的瓷器。17至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瓷器贸易进入巅峰期，中国瓷器蕴含的东方审美风靡欧洲宫廷与上层社会，欧洲王公贵族对青花瓷喜爱有加，以拥有中国青花瓷为社会财富与家族荣耀的标志。

19世纪之后，欧美收藏家对中国瓷器的鉴赏进入更完整且理性的阶段，从胎骨质量、釉料质地、着色技术、装饰形态等维度展开严谨鉴定。英国学者威廉·科斯特·蒙克豪斯和卜士礼撰述的《中国瓷器史》（见右上图，资料图片），以深入系统的学理探究回应了收藏家们的需求。该书以欧洲博物学为研究方法，参考借鉴《陶说》《浮梁县志》等中国古代典籍，将不同时代中国瓷器的特征、种类、制作工艺、纹饰款识、西方收藏史等内容娓娓道来，被誉为近代西方研究中国瓷文化的代表作。

《中国瓷器史》中有不少内容探讨中国瓷文化的灵气和神韵，展现出西方学者从器物出发，走近中华文明传统的研究路径。例如，考虑到当时欧美收藏家追求艺术品呈现的跨文化审美趣味，开始研究中国瓷器背后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蒙克豪斯专门对中国瓷器的年号、堂名、吉语、颂器、图像、匠人等常见款识，以及寿星、八仙、龙、凤、麟、龟等神话人物和动物进行了细致介绍。他注意到，荷兰人曾因不熟悉篆书的艺术变体“寿”字，而将其称为“蜘蛛款识”。他还例举卜士礼所藏的清朝乾隆入宝纹青花抱月瓶，瓶颈和瓶身分别有两个不同形状的“寿”字，瓶的边沿和足部则绘有象征幸福的蝙蝠在空中飞翔。这些绘制在瓷器上的“寿”“福”图文标识，反映出中国民众对生活与未来的美好祈愿。

作者着墨最多的，是琳琅满目的彩绘瓷。在蒙克豪斯看来，清代康熙时期中国制瓷业最大的成就之一，在于装饰艺术的日益成熟与丰富。同许多欧美收藏家一样，蒙克豪斯被“中国瓷器千变万化的色彩所散发出的魅力”深深折服，他以细腻笔触描绘艺术与技术的交相辉映，热情洋溢地向读者表达对彩绘瓷的由衷欣赏：透明釉下的钴蓝鲜艳夺目；红宝石般浓艳的牛血红与柔和的桃红，使钴酸铜色更更显华贵；精细的珐琅彩绘于半透明的蛋壳瓷胎之上，和谐而精美，

标志着中国制瓷工艺达到鼎盛。

蒙克豪斯去世后，卜士礼协助出版了他的遗著，并进行相关研究，尝试从材料与工艺角度建立瓷器的科学定义。针对西方学界关于瓷器起源时间的争论，卜士礼广泛征引中国古代文献，明确支持汉代起源说。他认为，“半透明”“玻璃状”应是瓷器区别于陶器的典型特征。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英国东方陶瓷学会第二任会长罗伯特·洛克哈特·霍布森。霍布森进一步认为，瓷器是添加了天然或人工熔制的陶器，经1350至1450摄氏度高温烧制而成。这些英国学者持续不断的探索，为现代瓷器科学定义的建立奠定重要基础。

论及近代全球陶瓷贸易时，本书强调了英国发挥的桥梁作用。纹章瓷是中国古代外销瓷器的重要品类，因按欧洲王室、贵族、城市或团体提供的纹章定制烧造而得名。纹章瓷始见于明代中期，现存最早的纹章瓷是一只带有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纹章的青花瓷壶，此后欧洲王室、贵族和上流社会争相定制这种优质、精美的中国瓷器。英国收藏家一度将中国出口的纹章瓷称为“洛斯托夫特瓷”，主要源于英国陶瓷小镇洛斯托夫特在瓷器贸易中扮演的角色。在原产中国的纹章瓷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一些素白瓷坯从景德镇运至洛斯托夫特，当地工匠仿照纹章风格对其施以彩绘，再销往欧洲各地。有趣的是，当地商人所提供的图样反过来影响了中国广州工匠，形成了市场需求推动下中西工艺相互借鉴、共同创造的新局面。

当然，欧洲制瓷业并不满足于只做学徒。经过百余年对中国瓷器的学习和仿制，德国迈森于18世纪初掌握硬质瓷烧造技艺，法国利摩日于数十年后建成欧洲最大的硬质瓷生产基地。在工业革命浪潮推动下，精于批量化制作的英国陶瓷工厂异军突起，后来居上。位于伯明翰和曼彻斯特之间的斯托克港称“英国景德镇”，这里出产的蓝柳纹瓷器图案最初源于中国青花纹样，通过将垂柳、宝塔、小桥、小船等中国意象重新组合，并增加苹果树、比翼鸟等英伦元素，风靡西方200多年。斯托克工匠还在原料中加入动物骨粉，制造出晶莹剔透、质地坚硬的骨瓷，韦奇伍德、皇家道尔顿等品牌至今享誉世界。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创造，瓷器不仅凝聚着顺应自然、因材施教的东方智慧，也在跨越山海的传播中促进了中外器物、技艺与审美的相知相鉴。2009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本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亦填补了世界遗产中“瓷”主题的空白。中国陶瓷文化的价值正不断获得世界的理解与认同。走过近2000年，从博物馆展柜到寻常人家，从学术研究到文化交流，中国瓷器仍在延续它的世界之旅，在与不同文明的相遇中绽放新的可能。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

静美诗巴丹

吴发荣



仿佛整个海洋都随之涌动。没有人不为这自然的伟力屏息，人类的渺小与生命的壮阔，在深海里悄然相融。

离开沸腾的鱼群，与海龟不期而遇。这里是海龟的乐园，绿海龟与玳瑁在此繁衍栖息，潜水时偶遇二三十只海龟是寻常事。它们慢悠悠地划水，厚厚的鳍肢划过水流，眼神安然。岩壁间的“海龟洞穴”是无数海龟用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光阴堆积成的归宿，无声诉说着生命的不息。

这片净土是世代守护的结果。一个多世纪前，这里是迁徙鸟类的庇护所，1933年被划为鸟类保护区，海鹰、翠鸟在林间栖息，为海岛平添几分灵动。20世纪80年代末，法国海洋探险家、电影制片人雅克·库斯托的纪录片让诗巴丹走入国际视野，潜水浪潮随之而来，隐秘海岛变为潜水胜地。为保护生态，诗巴丹严格限制每日登岛人数，严格的保护措施让这片海域远离喧嚣，保留最初的纯粹。

世间美景，往往需要跨越山海才能遇见，诗巴丹亦是如此。它以深海的静、生命的美、自然的奇，治愈每个奔赴而来的人。诗巴丹的静美是深入骨髓的安然。它藏在远离纷扰的深海，藏在自然与生命的和谐共生。这片被时光眷顾的海岛，以永恒的蔚蓝，镌刻在每个见过它的人心中。

仙本那是马来西亚沙巴州东海岸的一座滨海小镇，也是通往世界级潜水胜地诗巴丹的重要门户。初到仙本那镇区，老旧房屋挨挤挨挤，街道杂乱，空气里混着海腥味与市井烟火气。当渡轮离开太平洋西部边缘西里伯斯海的碧波，驶向36公里外的诗巴丹，所有纷扰被万顷蓝海涤荡，只剩天地间极致的静美。

诗巴丹像一枚深海中长出的“菌菇”，小巧玲珑，环岛步行不过半小时。它是马来西亚唯一不与大陆架相连的岛屿，由海底火山顶端的珊瑚礁堆积而成，从600米深的海底拔起，周边环境着珊瑚礁浅滩。

浅滩是诗巴丹温柔的底色。澄澈海水能见度极高，阳光穿透水波，在海底织就流动的金网。五彩珊瑚铺展成绵延花园，形态各异，或如鹿角舒展，或如伞撑开，海葵随水流轻轻摇曳，触手间藏着嬉戏的小丑鱼。400多种鱼类穿梭其间，斑斓的、银亮的、小巧的，成群结队，倏忽来去，将这片浅滩酿成流动的绮梦。

深海藏着诗巴丹最震撼的篇章。这里是观赏“海狼风暴”的绝佳之地。潜水员手握流钩，将自己固定在峭壁上。片刻后，成千上万条梭鱼如狼群般集结，形成巨大的漩涡鱼群，似黑色风暴席卷深海，阵型变幻，气势磅礴，